

利奥·福赫德

## 从伟大的长城到伟大的图书馆<sup>\*</sup>

——对当前国际上电子出版物、书本式出版物及图书馆建筑的一些看法

**ABSTRACT**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in 1996 is a most impressive achievement that the organisers are to be proud of. There has been tremendous progress i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library buildings in China. The author looks at the future of library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rary buildings and the new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hat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n believes that the library of the future will be a hybrid institution that contains both digital and book collections, and public library, in particular, will demonstrate a growing social role.

**KEY WORDS** Library building Book collection Digital collections Library services

**CLASS NUMBER** G251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同行们,朋友们:

我作为国际图联的正式代表出席这次学术会议,昨天的开馆典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希望诸位能允许我从谈论北京而不是上海开始我的演讲。这是自62届国际图联大会以来第一次回到你们美丽的国家。今天开始演讲以前,我首先要感谢全体中国图书馆界、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中国文化部对1996年国际图联大会的支持。感谢你们同时祝贺各位——这是国际图联感到骄傲的一大伟绩。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图联大会圆了一场梦。早在1934年,中国图书馆界就开始构筑这个梦。当时国际图联会议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会上,一位胡姓先生介绍了中国图书馆状况,并说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要通过采纳各种建议、意见,作好充分的接待工作,简而言之,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所有那些到中国做研究的学者。我们希望,尽管路途遥远,图联大会有一天将能够在中国召开。”希望终于实现了,我们已经向国际图情界证明……。

人们普遍对北京国际图联大会作出积极反应。尽管形式不同(以口头评论、信函、电话或电子邮件),但是他们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感谢举办了一次极为成功的大会,对中国的会议规划和安排作出很高评价,当然还对访问拥有悠久历史和巨大文化宝藏的中国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

仅几天前,在海牙国际图联总部,国际图联执委会举行12月例会,执委会成员从4大洲的8个国家(包括中国)飞往荷兰,出席集

\* 这是作者在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仪式暨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了这种状况。利用大型的共享目录数据库降低了找寻远程资料的成本,加之多种快捷的传送方式(尤以传真、快递为著)的出现,都使一些类型的图书馆在价值上发生了显著改变。学术图书馆越来越强调快速地从各处接触到各种书面信息,而不是试图自己拥有全部已知的书面信息,公共图书馆常通过更为实际的资源共享方式,也朝这个目标方向在努力。现代技术的力量不仅使图书馆之间可以更便捷也更廉价地共享资源,还使得读者可以接触到更多新的信息。这又将我们带回原先的问题:电子技术将以何种方式对书本式出版物和图书馆建筑造成影响?

接触电子化信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获取。有很多文章提出如何将线路排设至最后一英里(也就是说,将网络带入家庭),使能承受电脑价格的人更易利用电脑。然而,联接的问题十分重要。国际图联前专业委员会成员Narcy John指出,三个很基本的问题限制了对于电子出版信息的获取。

1. 有多少早期的印刷出版的信息资料已经或将被转化为数字化形式。
2. 有多少新的信息资料仅仅以数字化形式出版。
3. 从网络上能否接触到电子出版信息资料。

缺乏资料转换通常可以归咎于信息在市场上的实际价值,由于信息资料通常只以一种形式出版(一般为书面印刷形式),只有相当具有一些特殊的附加值时才会被以另一种形式(数字化形式)重新发行。对于目前图书馆中所收藏保存的很多知识内容而言,这种附加值是不可能明确的。

第二点,新的数字化资料更为复杂。商业考虑是很现实、很复杂和多源的。此外,电子出版物的市场到目前为止尚不如印刷出版物市场那样发达。比如,其发行机制及价格等因素仍很值得关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使用电子出版物的途径和手段将进一步减少数字化

信息资料的潜在用户和顾客数量。显而易见,将只有少数人需要,更少有人使用的信息资料数字化是不合算的。在当今数字化信息时代到来之前,图书馆人员通过劝说出版商和作者利用供需推动力来创造书本,强调了信息资料传播的需要。出版商则通过重印绝版的书籍,鼓励作者撰写某些专题的书籍来帮助图书馆人员。反过来,图书馆人员帮助出版商及其编辑人员确定需要新版资料进行论述的主要专题。在数字化时代,这些机制仍有应用,但方式上略有不同。例如,图书馆人员致力于大型目录数据库的发展和建设,创建书面资料的电子版本,出版期刊和杂志文章的全文库藏。

最后一点,关于能否在网络上使用电子化信息资料有着一套不同的考虑。所需要的是有能力将资料从封闭型转化成开放型,提供一种低风险的获取方式。由于图书馆人员已深入到这些问题中,因此图书馆又出现了新的作用。一大批图书馆人员,尤其是在欧洲与美国,已经决定自己创建电子化信息资料,而不仅仅是向读者提供他人制作的信息。现在还很难说清楚这一战略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尤其是对于该领域中其他主要从业者关系将造成何种影响

尽管获取电子化信息资料存在着一些制约,图书馆人员还未有明确的发展战略,有一点已经清楚,即那些预言图书馆在“后印刷时代”将严重衰落的人错了。在许多情况下,图书馆自身正在发展成为获取高科技信息贮存和检索系统的核心,图书馆人员确实已经努力挖掘了新技术的潜力和应用可能性。但我们不能忽视这其中未包括很多文化、法律和社会政治难题。

图书馆使人们能够接触到各种知识——不是书本式电子记录,而是知识。知识需要组织和环境,事物不会象海洋中的一个浪花那样简单。正如中国哲学思想中所论述的那样,知识不能被孤立起来看待和处理。英国图书

中两天的会议。这是执委首次有机会正式讨论 62 届大会的结果。这次会议听取了中国组委会提供的报告。孙蓓欣女士着重讲了这个报告的最具特色之处,受到执委的极大欢迎。在第二天的会议里,执委们都惊讶万分。因为孙蓓欣女士收到中国财政部同行的消息说,北京会议对国际图联总预算的贡献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这也是 62 届大会创下的又一项纪录。执委会向孙女士报以热烈的掌声。

女士们先生们,我发现很容易将我的注意力从北京移到上海。首先,我们一直很赞赏北京组委会代表中国作出的努力,毫无疑问,国际图联会得到全体中国图书馆界的大力支持。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今年 7 月我和妻子访问上海、杭州和南京,深切体验到这种关注和热情不仅来自于图情专业的有关人员,也来自于省市政府的代表。

首先让我向诸位转达国际图联理事长罗伯特·威奇沃斯,国际图联官员和会员对激动人心的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的祝贺。这是对一座值得世界尊敬和举世公认的馆舍的国际性的祝贺。这里我私下说一句,我的同行也是朋友 Piet Schoots 作为顾问参与了这项巨大工程,对此我内心感到高兴和骄傲。这表明荷兰人仍然保持着 18 世纪初与中国开始商业交往时的那种开拓者的形象。有句世言说道:在商业交往中,所有的外国人都是瞎子,荷兰人睁着一只眼,中国人则双目生辉。

这个新建筑将容纳和蓄并上海两个最大的信息机构: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科技情报所。有句中国话说:“好房子易得,好邻居难寻。”这种同一馆舍中的两个邻居和同一个新的组织框架下的两个邻居将日益引起中外关注。

在新馆所开馆之际,举办一个面向未来的学术会议确实是个好主意,因为这样一个庞大的建筑的开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关注也伴着疑问。这些疑问也是人们向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新馆和旧金山公共图书馆新馆提出的问题。

我今天演讲的论题是展望图书馆工作的未来。我们今天处于一个新的图书馆建筑和新的信息环境迅速发展的时代。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以至于人们认为在今天世界各国拔地而起的新的图书馆建筑中看不到变化的影响。

正如英国图书馆馆长 Brian Lang 所说的那样:“20 世纪末对图书馆来说是个充满矛盾的时期。一方面,至少在欧洲,人们回首即将结束的年代,将看到这是一个伟大的新的图书馆建筑诞生的年代。英国、法国、德国和丹麦国家图书馆都开放了他们的新馆。其中巴黎和伦敦的图书馆建筑在规模上是个里程碑。他们是各自国家在这个世纪的最大的公共建筑。另一方面,图书馆正在经历一场信息革命,信息革命的成果告诉人们中心图书收藏将是多余的。”

换言之,批评家们可能会提出,在一个电子出版不断成长、电子图书馆服务不断发展的世界中,图书馆应该越来越小。这是一个很显著的问题,已不再是局限于建筑的大小和空间;是不是我们作为图书馆成员和图书馆的建造者已经跟不上周围环境的发展步伐;是不是我们成了井底之蛙,只能看到头顶的一片天空,看不到更为广泛全面的视野?

韩素音说过:“你看待一个问题不能脱离其周边的环境,它的历史渊源,它最深层的植根之处。”因此,我们必须回顾图书馆的历史,回顾它作为“知识宝库”的巨大作用,才能正确地回答上述问题。

20 世纪中,大型的国立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术图书馆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丰富的馆藏赢得了国内国际上的声誉。这些声誉往往源于它们能就地为读者提供多少书面资料。图书馆可能拥有的最大魅力就基于其占有的信息量。本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图书馆要获取遥远的信息往往受到获取时间和相关成本的困扰。这些问题有时至今会由图书馆转嫁至读者。大型计算机网络从根本上改变

馆馆长曾说: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中,我们图书馆的现状是对于图书馆阅览室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图书馆收藏了巨大的宝藏。无论是 18 世纪明代的百科全书(我曾有幸在杭州得以一观)还是最新的热力学论文。图书馆的成员希望更多地将新旧技术并用。

总之,未来的图书馆将是一个混合体,同时包含数字化和书本化收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有些图书馆的领导展望的只是数字化图书馆,然而图书馆大多数仍将发挥作用,特别是将显示越来越大的社会价值。图书馆将被作为很好的社团会议场所,作为社团社区的综合者,跨越种族语言的障碍,成为社区的信息中心。公共图书馆受到广泛的尊重和信任。正如旧金山市立图书馆的人员所说的:“公众认为一个大型的图书馆系统对于一个大城市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马先生会同意对于上海而言亦是如此。

上海图书馆新馆为中国一个时期以来图书馆的密集建设添上了光彩的一笔。几百座,可能是几千座新的图书馆拔地而起——在 2500 座公共图书馆中有近 1000 座是新建的。召开国际图联大会期间,《中国图书馆建筑》一书出版了。这本书给人印象深刻,呈显现了 230 座图书馆大楼的风貌,全部建成于八九十年代。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李明华先生分析了中国图书馆大楼建筑设计上的巨大进步,指出了 4 个重要因素。

1. 全国范围的图书馆新楼建设(从中获得的实践明显加强了现有经验)。

2. 图书馆大楼设计标准(1987)的实施,加之图书馆人员和建筑师之间一系列的系统讨论和意见交流(达成了原则共识:适应性、高效性、灵活性、舒适、安全、经济、美观)。

3. 图书馆人员积极参与,图书馆人员和建筑师紧密合作,广泛听取专家的建议。

4. 国家的开放政策使得参与图书馆项目的建筑师、专家和学者有条件到国外进行实地考察,有条件开展学术交流——许多国外专家

到中国讲学,有些作为顾问参与工作,将国外的建筑设计构思带到了中国。这其中国际图联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的联系至关重要。

上海图书馆新馆的落成不会这一发展潮流的中止。就如我们所说,中国的许多图书馆正在建设。它们可能不及这座图书馆那样的壮观,但它将有助于加强中国整个图书馆系统,这是一个覆盖了 15 个省、4 个自治区和 34 种语言的大系统。

建筑师和图书馆人员的工作不容易——不过这是在面临挑战时所难免的。正如中国人所说的,在平静的大海上行船,是人人都会的。我想起孔夫子曾这样说过:进步得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止步不前!变化的世界将不断呈现新的挑战。

至此,我想引用克利弗兰公共图书馆馆长恰如其分的一段话来结束发言:“要在知识的当今世界中找寻道路,我们需要经纬并重,阴阳并举,兼顾电子出版物和书本出版物。数字化信息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对于原有事物的发展,尽管发展极快,信息只是用以获取知识的一个部分。归根结底,不是信息的速度,甚至不是信息本身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意义。最关键的仍然是我们用来做什么。”

我希望上海图书馆拥有一个生机勃勃的未来,希望它的馆藏能为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的信息知识构成作贡献,希望它同时成为图书馆界人员和建筑师的良好范例,就象孔夫子说的那样:只有那些不仅珍惜已有的知识而且不断积累新知识的人才能为人师表!

谢谢!

利奥·福赫德 荷兰人。1984 年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并获硕士学位;1988 年获该校历史系博士学位并开始在海牙图书馆和信息教育学院任教。1992 年至今任国际图联秘书长。

(来稿时间:1997.4.12。编发者:李万健)